

前言

本期收錄三篇論文，依序分爲〈威脅認知與沙烏地阿拉伯的戰略選擇〉、〈以色列—哈瑪斯衝突中情報成敗之探討〉與〈中南半島國家對於中資水電開發的回應—以緬甸與寮國為例〉，第一篇與第二篇文章均討論中東議題，而第三篇文章則討論不同類型的非民主國家如何應對中國對能源基礎建設的投資。

第一篇文章討論沙烏地阿拉伯在美中競爭下的外交戰略選擇及可能走向，作者認為動態平衡的概念提供第一刀 (first-cut) 的解釋，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透過「國家外交政策的面向」延伸出第二刀，因此領導人的意象是一個重要的分析焦點，而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案例中，哈紹吉事件是觀察沙國領導人意象與威脅認知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整體來說，沙國同時受到全球與區域的「極數」影響，也就是「第一刀」的影響，但整體來說，美沙的關係是穩定中的不穩定，特別是當美國願意提出更多承諾時，沙國是毫不猶豫地展現對美國的支持；而沙國並未因經貿往來的增長而調整其中國政策，而是在面對來自美國、且較不友好之言論時，採取與中國友好的避險策略。必須強調的是，在無法確定未來國際體系走向兩極還是多極時，沙國雖試圖與中國友好以增加對美的談判籌碼，但整體仍較傾向美國。此外，在威脅認知與區域多極等因素下，沙國最關心的還是如何平衡伊朗。

第二篇文章則是國內學術刊物較為罕見的議題，嘗試回答以色列—哈瑪斯衝突中的情報成敗，從背景來說，2023 年 10 月哈瑪斯成功奇襲以色列，此係因其成功地躲避了以色列的科技監控，並且運用雙面間諜、欺敵等攻勢手段，削弱了對手的情報能力。從哈瑪斯的角度來說，哈瑪斯至少花費一年以上的時間策劃這項攻擊，同時加上伊朗與真主黨的支援才使攻擊得以奏效，但從結果論，哈瑪斯擁有全方位的情報蒐集能力，已超越準軍事部隊。而從以色列的角度來說，以國

身為民主政體使得反情報工作本已具有難度，同時以國過去應對來自伊斯蘭世界威脅的政策邏輯也使以國承受極大的國際壓力，因而不大可能先發制人地阻止哈瑪斯的攻擊。此外，加密技術的進步導致監聽和訊號情報的蒐集更加困難。在哈瑪斯嚴密控制之下，以色列很難在加薩從事間諜活動，只能依賴科技情報，而哈瑪斯不僅從伊朗取得先進的加密與反監聽技術，同時也採取極為嚴密的安全防護措施，例如避免使用手機、電子郵件，落實部門區隔之規定，防止哈瑪斯士兵得知彼此的作戰任務等，最終達到行動保密的效果。最後，以色列誤判了哈瑪斯的能力和意圖，誤認哈瑪斯不具備大規模攻擊的能力，或不敢承受挑戰失敗的風險，落入認知偏誤與鏡像思維的陷阱。

第三篇文章則從威權體制的差異解釋威權型態的不同如何影響緬甸和寮國對渠等與中國合作開發水力發電之政策差異。在緬甸的案例中，因為對領導人而言，只要鞏固好「最小獲勝聯盟」的支持，就可以繼續執政。地方民族軍的勢力並沒有大到足以威脅軍政府的威權領導，需要與其進行談判妥協，所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鎮壓那些反對的地方軍隊，故每一階段政治領袖偏好的生存策略依序仍為「鎮壓＞制度＞酬庸」；相對地，寮國政治經濟仍然牢牢地紮根於政黨獨裁的威權體制。在寮國一黨長時間統治下，政治領袖擁有更大的獲勝聯盟和更深的正式制度基礎，不需要靠鎮壓也可以維持政權。許多水壩建設的背後都是寮國菁英、國內私人大壩開發商所構成的庇護網絡所持有，政府和這些外商的收益分配常是秘密的，因此人民無法監督水電收入的流向，政治領袖透過水電財源收入來加強自己的權力，偏好的生存策略依序為「制度＞酬庸＞鎮壓」。是以，緬甸首要的生存策略仍然是「鎮壓」地方民族軍，導致水電站的開發延遲；而寮國偏好的生存策略是透過水電發展來增加財政自主性，「酬庸」親信來獲取支持，因此傾向與中國合作在境內建造一系列水壩。